



# 乡村民宿集群驱动乡村振兴： 逻辑、案例与践行路径

何成军 赵川

**摘要：**乡村民宿集群以在地化发展激发乡村主体活力，多维度驱动乡村内生性发展，有助于乡村振兴和持续性发展。乡村民宿集群以绿色生态的发展方式维护良性的人地关系，吸引更多人才流入乡村，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共生发展；多元化主体在乡村空间集聚实现多种要素重聚乡村，丰富空间功能，实现乡村在地化发展；乡村民宿集群激发乡村本土村民自治与多元主体共治，有效提升治理水平；乡村民宿集群对乡村性的要求，促进物质文化保存修复与精神文化认同记忆，能有效减缓乡村衰败。

**关键词：**乡村民宿；集群；乡村振兴；地方实践

**DOI：**10.13734/j.cnki.1000-5315.2022.02.012

**收稿日期：**2021-11-1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协调度评价、障碍因子诊断及协同路径研究”（17XJY013）、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2020年度文化和旅游科研重点项目“旅游民宿助力传统村落振兴模式、影响机制及提升路径研究”（2020WLTLYLZD002）、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项目“后旅游扶贫时代四川秦巴山区乡村振兴逻辑重构及障碍因子诊断”（SLQ2019B-06）、四川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技创新与新经济研究中心项目（CYCX2021ZD02）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何成军，男，四川南充人，四川城市职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E-mail: 1410679772@qq.com；

赵川，男，四川凉山州人，理学博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的不充分<sup>①</sup>。当下中国大多数乡村的发展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一是乡村产业发展滞后，造成生产要素闲置和资源浪费；二是乡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导致人口结构失衡；三是乡村文化衰落，传承断代；四是乡村治理落后。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新时代乡村的发展，并可能滋生更多的社会问题<sup>②</sup>。

为了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等重大问题，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国家实施了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以来，学术界对乡村振兴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新发展阶段探究乡村发展的适宜路径，对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乡村振兴尤为重要。在乡村发展的路径选择中，以小众化、私密性、乡野性见长的乡村民宿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的驱动作用愈发受到关注，相关研究聚焦于乡村

①周立《乡村振兴战略与中国的百年乡村振兴实践》，《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3期，第6页。

②刘正佳、李裕瑞、王介勇《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及其前沿观点——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相关主题评述》，《地理学报》2018年第8期，第1607页。

民宿与美丽乡村建设关系<sup>①</sup>,乡村民宿对乡村空间发展的改变<sup>②</sup>,乡村民宿的空间分布规律<sup>③</sup>,乡村民宿资源挖掘及管理经营<sup>④</sup>,以及乡村民宿集群发展对乡村发展的促进作用、对策路径等<sup>⑤</sup>。但现有研究对乡村民宿与乡村发展,特别是乡村民宿与乡村振兴之间内在关系的探究还不够深入<sup>⑥</sup>,对乡村振兴的驱动逻辑和实践路径等内容的研究还存在不足。事实上,乡村民宿集群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耦合性和系统性,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因此,本研究尝试探究乡村民宿集群驱动乡村振兴的合理逻辑,并以国内重要乡村民宿集群为典型案例,总结乡村民宿集群驱动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这对于“两山理论”指导下的各地区各乡村走生态发展道路,依托乡村民宿集群驱动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 一 逻辑建构:乡村民宿集群有效驱动乡村振兴

### (一)理论模型

乡村作为一种地域实体,需要在产业、文化、空间形态、社会治理等方面构建自己的价值体系。在人地关系学说中,乡村的价值体系主要包括自然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这是立足于人类的需要和认知进行的理论架构,反映的是人与所在地之间的相互影响,体现的是人与地之间的特殊关系。周尚意把乡村人地关系划分为自然层、生计层、制度层和精神层,简称“四层一体”<sup>⑦</sup>,凸显了乡村人地关系的本质和内涵<sup>⑧</sup>,可作为本研究的基础概念。自然层是乡村赖以存在的基础,涵盖大气、水、土壤等自然地理环境;生计层涵盖土地、资本等生产生活需要的各项资源;制度层是指导和约束乡村各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组织体系;精神层是乡村各类文化、主体意识等精神体系。“四层一体”通过乡村人地系统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联、影响、共存、演化,这个过程也就是乡村振兴的过程。基于该理论,本研究构建了 NLSS 概念模型(如图 1 所示)。

### (二)逻辑体系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由居民自发经营和政府引导的乡村民宿兴起,并逐渐从欧洲传入美国、日本等地。在中国,台湾地区最早出现乡村民宿,大陆民宿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农家乐的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乡村民宿通过资源集中优化组合、流量重新有效聚集的“抱团取暖”方式构建区域产业链,走规模化发展道路,形成高品质流量共享、多元品牌聚合、精细化产业分工、集群式发展的乡村优质平台,成长为乡村旅游及乡村振兴的驱动力。从外在表现看,乡村民宿集群是民宿在空间上的一种聚集。在空间上聚集的乡村民宿,以地理区位优势实现资源、市场、产品、品牌和利益共享<sup>⑨</sup>,转变乡村民宿单一性功能,延伸乡村产业链,构建乡村“民宿旅游生态”,呈现产业集聚的一般特征<sup>⑩</sup>,实现乡村的高质量发展,被认为是一条较为有效且质量较高的乡村发展路径。

本研究认为乡村民宿集群驱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为:由于旅游的生产 and 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同步性,乡村民宿集群的发展推动要素、主体等由城市回流到乡村,提升了乡村的供给性,丰富了乡村的功能,乡村由原来的单纯性生产空间演变成了生产和消费同步的空间,在生产、生活、生态方面进一步凸显乡村性,从而吸引更多的城市居民到乡村旅居。与一般的乡村旅游相比,乡村旅游停留的时间更长,消费面更广,城乡关系网络因乡村民宿集群而变得更加严密,使得乡村民宿集群在一定程度上驱动了乡村的振兴。

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涉及乡村人地关系的调整与优

① 祁祚峰《美丽乡村建设下乡村民宿旅游可持续发展策略分析》,《农业经济》2020 年第 8 期,第 64 页。

② 王敏、王盈盈、朱竑《精英吸纳与空间生产研究:民宿型乡村案例》,《旅游学刊》2019 年第 12 期,第 77 页。

③ 龙飞、刘家明、朱鹤、李涛《长三角地区民宿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地理研究》2019 年第 4 期,第 953 页。

④ 胡敏《乡村民宿经营管理核心资源分析》,《旅游学刊》2007 年第 9 期,第 67—69 页。

⑤ 侯云霞、代涵奕《乡村民宿旅游导向下民族村寨“三生空间”的演变与重构——以恭城瑶族自治县红岩村为例》,《贵族民族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93—100 页;王璐、郑向敏《乡村民宿“温度”与乡村振兴》,《旅游学刊》2021 年第 4 期,第 7—10 页。

⑥ 蒋佳倩、李艳《国内外旅游“民宿”研究综述》,《旅游研究》2014 年第 4 期,第 21 页。

⑦ 周尚意《四层一体:发掘传统乡村地方性的方法》,《旅游学刊》2017 年第 1 期,第 7 页。

⑧ 高璟、吴必虎、赵之枫《基于文化地理学视角的传统村落旅游活化可持续路径模型建构》,《地域研究与开发》2020 年第 4 期,第 74 页。

⑨ 龙飞、戴学锋、张书颖《基于 L-R-D 视角下长三角地区民宿旅游集聚区的发展模式》,《自然资源学报》2021 年第 5 期,第 1306—1307 页。

⑩ 游上等《少数民族民宿聚落智力资本与组织绩效研究——以拉祜族民宿聚落为例》,《商业经济研究》2018 年第 6 期,第 18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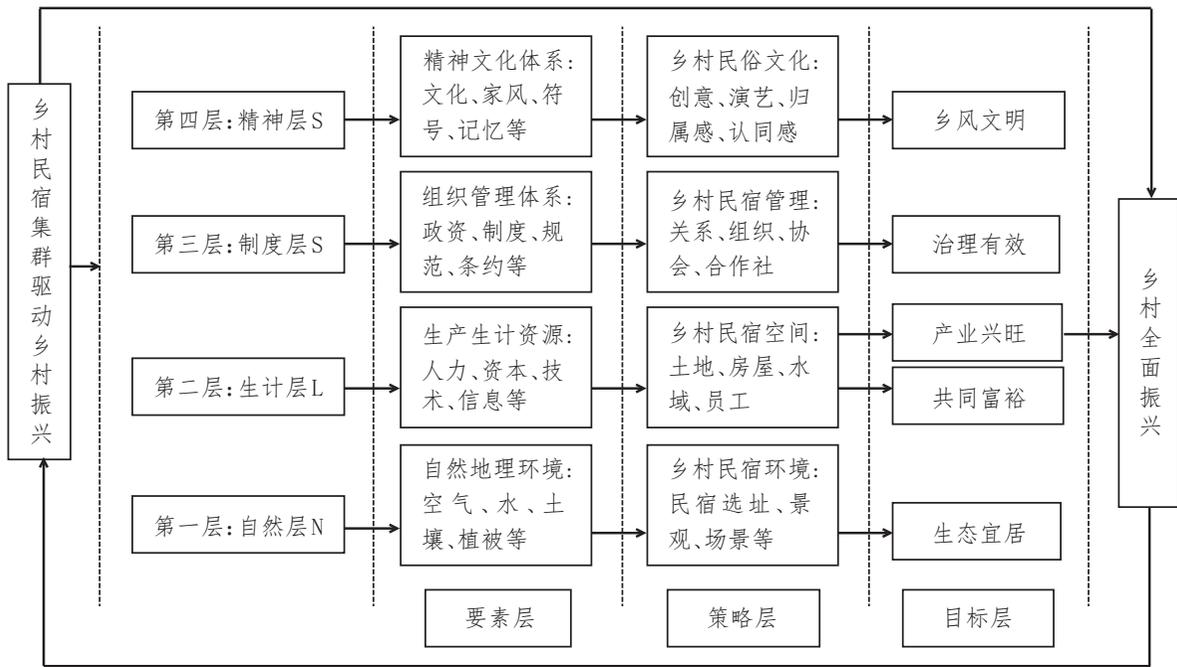


图1 乡村民宿集群驱动乡村振兴概念模型(NLSS模型)

化,这个动态过程涵盖乡村经济、文化、治理、环境等方面,对应了乡村“四层一体”的逻辑架构。在自然层面,乡村民宿集群的选址对自然环境的要求较高,同时,其发展能保护环境、优化景观,符合乡村可持续发展及乡村生态宜居的原则。在生计层面,乡村民宿集群的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留存和修复乡村传统建筑,在盘活乡村闲置土地、房屋、水域等资源的同时,能就地吸纳居民创业就业,丰富乡村业态,增加乡村居民收入,符合乡村产业兴旺、共同富裕的原则。在制度层面,乡村民宿集群的发展实现乡村民宿多元主体在乡村的集聚,重构乡村的社会关系,对于乡村组织的完善和乡村治理的优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符合治理有效的原则。在精神层面,出于丰富业态、延伸产业链等考虑,乡村传统文化作为宝贵的资源得到重视。在文化创意开发、文化演艺等方面,乡村民宿集群的发展赋予了文化新的活力。乡村民宿集群的发展能培养游客的地方情感、重塑乡村记忆,提升乡村居民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符合乡风文明的原则。

(三)案例与方法

为了避免单一案例论述的局限,本研究以多个地区的乡村案例探析乡村民宿集群在乡村振兴中的影响与作用。近五年,研究团队通过参与乡村旅游重点村、传统村落名录等申报评选活动以及对四川、浙江、重庆、云南、安徽、宁夏、北京等地 30 多个村落的田野调查,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福建省永泰县岚口村、四川省丹巴县甲居藏寨、四川省成都市彭州蟠龙村、江苏省宜兴市洩西村、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明月村、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红栋村和浙江省桐庐县荻浦村 8 个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民宿集群进行研究,单个村落的调查与研究均在 10 天以上。所选择的民宿集群均是在“四层一体化”框架下驱动乡村振兴的代表,在不同层面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由此体现乡村民宿集群驱动乡村振兴系统性的作用。

二 地方实践:乡村民宿集群驱动乡村振兴的案例

(一)乡村民宿集群驱动乡村人与自然共生

长期以来,“城市优先”发展的观念为乡村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与保护提供了较为自由的空间。但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城市人地关系紧张的问题成为了突出问题,环境生态性与自然性成为了乡村区别于城市的突出特征。乡村环境的保护与留存需要绿色生态的发展方式及良性的人地关系来实现,民宿以优质环境为前提,坚持乡村绿色发展,为乡村绿色生态振兴方式提供了一种选择。

1. 乡村环境可持续

鲁家村位于浙江省安吉县东北部,以山地丘陵为主。2011 年以前,鲁家村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村民以

外出务工为主,全村没有产业,人均年收入不足1万元。2011年,鲁家村以美丽乡村精品村创建为契机,着力改善人居环境。2012年,鲁家村实施了“村庄美化、道路硬化、庭院绿化、村组亮化、水源净化”(“五化”)工程,完成了鲁家湖、游客集散中心、文化中心、体育中心(“一湖三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七山一水两分田”的生态格局。2013年,鲁家村专项设计18个家庭民宿和农场,同时配备小火车串联各民宿和农场,形成一产和三产相结合的民宿旅游发展模式。2015年,鲁家村基本建成民宿旅游示范区,村民通过开办民宿、农家乐,参与村集体工作等方式实现全民就业。2016年,鲁家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增至2.8万元,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2017年,鲁家村采取“1+3”联动发展模式,即以鲁家村为核心,辐射带动南北庄、义士塔和赤芝三个村,打造能复制、可推广的农业产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最终成功入选全国首批田园综合体试点。

## 2. 乡村人才可持续

福建省永泰县同安镇岚口村缺乏产业,人口外流严重,收入来源单一,乡村活力不足。2017年,福州市台协会人才委员会与福州阳光学院合作,从台湾地区引进66个建筑师团队、200多名乡建乡创人才,组成乡村民宿设计帮扶团队。2020年,团队选择了乡村建筑风貌质朴的岚口村为帮扶对象,借鉴台湾地区在社区营造、乡村建设上的经验,设计“岚口·遇见台湾”品牌,把岚口村打造为具有闽南风情的网红民宿村,并指导村民进行民宿的运营与管理。通过示范、培训与指导,帮扶团队培养了一大批民宿设计、经营管理的本土化年轻团队,村民通过经营民宿、参与民宿服务等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收益,返乡的年轻人也逐渐加入到民宿的经营与管理中。同时尾林村、西安村等周边村落借鉴岚口村的经验,也纷纷发展乡村民宿,逐渐形成了民宿集群。这个民宿设计、经营管理团队既立足乡村生态环境,又以乡村民宿集群为支点,提升了乡村的生态环境,在岚口村形成了“人一业一村”的生态闭环。

鲁家村和岚口村以发展乡村民宿为起点,通过改善乡村人居、从业环境,改变乡村的生态和人文格局,树立起保护生态环境、发展乡村民宿旅游的共同目标。他们通过民宿体验旅游加快乡村对外交流和乡村自身引流,逐渐形成了以生态环境为优势的乡村民宿集群,并以集群的优势吸引更多的人才到乡村及周边区域创业就业,把保护乡村生态环境、走民宿发展之路的经验传递到更广阔的乡村,以此形成良好的民宿“旅游生态圈”,带动了乡村生态环境和乡村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乡村产业、人才、生态协调发展的难题,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

## (二) 乡村民宿集群驱动乡村生产要素重聚

乡村产业发展是乡村经济发展的基础,长期以来,乡村产业的缺失或衰退造成了乡村的衰败。城市优先发展使乡村大量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流向城市地区,乡村赖以发展的要素流失,使得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缺乏活力。乡村民宿的发展能吸引大量资本、信息技术和劳动力回流到乡村地区,盘活乡村土地、房屋和资产等要素,驱动经济产业结构在当地的调整与优化,促进当地乡村资源开发,增加村民就业机会,提升居民收入。

### 1. 产业结构多元调整

四川省丹巴县甲居藏寨被专家和游人称之为“藏区童话世界”、“嘉绒风情名片”。在2005年《中国国家地理》发起组织的“选美中国——中国最美的地方”大型评选活动中,丹巴甲居藏寨位居“中国最美的六大乡村古镇”之首。21世纪初,丹巴甲居藏寨开始发展旅游,现已成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川西重要的旅游目的地。2002年,丹巴县甲居藏寨第一家民宿率先挂牌经营,此后,家庭经营民宿数量不断增加,乡村民宿集群逐渐形成。2019年,丹巴美人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入驻甲居藏寨管理景区,全寨的民宿经营管理逐步规范化。村民的民宿接待逐渐从单一的住宿和餐饮服务演变为住宿、餐饮、藏族歌舞表演、家庭特色文创、藏式庄园体验等复合型服务,甲居藏寨由原来的观光型目的地向度假型目的地转变,由藏式农业村寨向服务型村寨转变。在乡村民宿发展之前,甲居藏寨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牛羊养殖、高原果蔬、藏药、山珍和少量的甲居藏寨“半日游”观光客餐饮、副食接待,家庭年均收入不到2万元。发展民宿产业后,藏民利用自家院子、碉楼、房屋参与民宿接待,原有的农业产业更加注重品质化,提升了农业附加值,再加上景区门票收入分红等,到2019年,村寨人均年收入达到2.5万元,高于周边其他村寨。乡村民宿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村寨旅游

产品的提档升级,拓宽了村民的收入渠道,优化了村寨的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在参与旅游接待的过程中,村民参与对外投资与发展的机会更多,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

## 2.空间功能多样调适

西方国家乡村发展的历程和道路经验是从“生产主义范式”转向“后生产主义范式”<sup>①</sup>,表明乡村功能的复合性越来越强,乡村空间从原来较为单一的农业生产空间转向生产、生活、生态等综合性空间。一方面,乡村天然的生态环境、闲适的生活氛围成为乡村民宿集群化发展的优势;另一方面,乡村民宿集群化发展又驱动第一产业生产为主的乡村向集居住、创业、就业、体验、消费等功能为一体的乡村转型,这种转型进一步刺激了乡村基础设施提升、市场开发等,为乡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环境。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蟠龙村毗邻“龙门山国家地质公园”、“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水河国家森林公园”、“龙门山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大熊猫国家公园”。2018年以前,该村村民以种植业、烧砖及周边务工等为生,良好的地理和旅游区位并没有给其带来经济上的高收益。2018年,村集体决定利用紧邻大成都、周边生态旅游资源富集等优势,走民宿集群发展道路,引入成都市鹿野小院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统筹周边7个村子,规划了18.7平方公里的“龙门山·柴村民宿产业园”,建成“无所事事”、“蟠龙小院”、“贾园·方今”等精品民宿6家,餐饮、茶歇等公共交流空间5处,学习、体验、创作空间4处,乡村集市1处,同时实施以白瓷文创为主题的“金城窑”文创展馆项目,打造了集主题化度假住宿产品、特色餐饮体验、乡村文创、山林休憩、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民宿旅游度假区。2019年,全村经济收入4097.2万元,全年游客接待量21.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892.6万元<sup>②</sup>。产业结构的调整重塑了乡村的空间功能,蟠龙村从农业为主的较为单一的生产性空间逐步转变为集居住、休闲、艺术、文化等功能为一体的消费性空间。

通过对甲居藏寨和蟠龙村的案例的研究可以发现,乡村民宿集群发展将原有的乡村经济社会形态进行了重塑,推动生产要素逆城市化回流至乡村。即以一种新兴业态方式盘活乡村资源,把乡村原有的房屋、田地、溪流、小道、村民等场景化、主题化、景观化、故事化,形成多功能、多元素、多维度的乡村人居空间,打破农民单一从事农业生产的传统,提升了乡村的吸引力,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从产业结构和空间功能上搭建起连接乡村和城市的桥梁。这为具有乡村民宿发展潜力的乡村在产业结构调整 and 空间功能调适上提供了多元化的路径指引。

### (三)乡村民宿集群驱动乡村公共治理提升

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规律下,传统的中国乡村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村民内部关系,维护着乡村社会秩序,协调乡村各方利益,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乡村社会结构。然而,在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逐渐瓦解,乡村的公共属性、集体属性逐渐削弱,村民的集体认同感逐渐降低,乡村内部松散,乡村治理面临着难题。在此背景下,以村民协作、共同参与为特征的乡村民宿发展被认为是重构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路径。

#### 1.乡村本土村民自治

新时代的乡村治理需要打破传统“族长”权威治理和乡村精英治理双核治理模式,建立起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村治理制度,激发乡村自治活力,培育乡村内部的治理主体,提升乡村的内生发展动力。江苏省宜兴市湖洑镇洑西村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景、浓郁的传统文化和淳朴的乡村民风,建设特色民宿,推进转型发展,开创了新农村发展的新局面。村民参与民宿发展的程度较高,民宿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并逐步向差异化发展,实现一户一特色,形成了静心小屋、冷家、竹月·原乡、心味原色等精品民宿典范。为了避免恶性竞争和雷同发展,村民创新管理模式,成立民宿协会。民宿协会制定民宿标准,规范村里民宿的经营管理,通过新媒体等平台搭建会员贴心、游客放心的民宿旅游服务平台,在全村开展星级文明户、五好家庭等评比活动,树立好村民的典型,正确引导村民以榜样的力量提高思想文化素质,优化社会风气。同时,洑西村成立大地

<sup>①</sup>John Holmes, "Impulses Towards a Multifunctional Transition in Rural Australia: Gaps in the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2, no. 2 (April 2006): 142-144.

<sup>②</sup>数据来源于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申报资料,彭州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惊艳!彭州市蟠龙村,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腾讯网,2020年7月14日发布,2020年7月15日访问,<https://new.qq.com/rain/a/20200714A0RUNW00>。

春农产品专业合作社,采取“公司+基地+农户+市场”的模式延伸民宿产业链,扩大乡村产业规模,打造品牌产品,让没有开办民宿的村民也能通过相关产业渠道增收,享受到发展乡村民宿带来的成果。洑西村乡村民宿从无序发展到良性发展、从自发经营到有序经营的过程是市场自觉调整和实践的结果,洑西村自治组织的出现和优化是村民内生主体自治意识觉醒和自治管理优化的呈现。

## 2. 乡村多元主体共治

除了吸引村民自发参与民宿经营外,乡村民宿的发展还吸引包括引入的经营公司、旅游新村民、投资个人或组织、社会公益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参与,形成了平等相处、合作共赢的有效治理体系,推动了乡村优化治理。21世纪初,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明月村是一个缺乏产业和劳动力的“空心村”。启动新农村建设后,凭借2000亩茶叶、6000亩雷竹等经济作物的规模化种植,明月村开始走文创旅游的发展道路。2012年开始,明月村先后引进陶艺家、艺术家、设计师等“新村民”100余名,成立以村民为主体的明月村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引入蒲江3+2读书荟,联合i20、夏寂书院等多家公益组织,深耕细作社区营造,定期开展“明月讲堂”、“明月夜校”、“明月画室”、“明月陶艺”等公益培训。近几年,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明月村先后引进文创项目41个,引入和支持本村村民创办民宿76家。2019年,明月村文创及乡村旅游总收入超过1亿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在发展乡村文创及民宿产业以前,明月村村民与外界的联系较为单一,村内力量薄弱且涣散,治理效率低下。文创项目的引进带动了当地村民参与生态农业和乡村民宿产业的发展。政府负责项目规划引进、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成为明月村发展的领路人、带头人;公益组织与旅游合作社通过夜校、画室、歌舞队等组成治理小组织,关注村民的发展与和谐社区的营造;各个组织和个人在村内形成了有理念、有目标、有任务、有追求的治理主体,把明月村打造为一个共创共享的新空间。

从洑西村和明月村案例可以看出,乡村民宿带来的旅游流对乡村组织和乡村主体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乡村内生主体治理意识觉醒,根据乡村发展现状采取优化治理模式,完善治理制度,形成了乡村的有效治理。乡村的有效治理是乡村产业协会、合作社等组织自我调节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地保证乡村产业有序发展与乡村居民生活协调的过程。随着乡村民宿集群的扩大,外来主体的进入进一步加强了乡村对外交流,内生主体主动接纳外来主体、外来主体积极融入内生主体,实现了多元主体的嵌入,共同维护乡村秩序,保证了乡村产业的有序发展和良性竞争,是一条乡村有效治理的可选路径。

### (四) 乡村民宿集群驱动乡村文化在地传承

“乡愁”话语导向下的新时代乡村振兴<sup>①</sup>,既需要在空间利用、传统建筑留存、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升乡村的特质,还需要在生产生活方式、文化氛围、价值观念等方面突出乡村区别于城市的特征<sup>②</sup>。因此,乡村性可以理解能够为体现本土独特地域生产、生活、文化、空间的元素及符号,其蕴含的乡村优秀文化能够起到价值引导的作用,承担起文化治理功能<sup>③</sup>。

#### 1. 物质文化保存修复

乡村的衰落最直观的表现是乡村物质景观的衰败,从某种意义上讲,乡村物质景观的修复与留存是乡村振兴的第一步。立足于乡村房屋及周边环境的修复与还原,为游客提供住宿、体验、旅居的空间是感受和体验乡村文化的直接渠道。

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红栋村是一个具有清朝历史风貌的古村落,村落大片的清朝传统民居具有浓厚的川东北建筑风格。全村外出务工人员比例较高,村民普遍到县城买房定居。2017年以前,村落建筑保护程度低,年久失修,破坏严重。为激活乡村资源,巴中市恩阳区政府根据红栋村的乡村聚落基础,决定修复以李家大院为代表的清朝民居,打造“巴山民宿”典范。2017年,在巴中市弘昌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主导下,传统夯土老屋得以改造,建成了李家大院特色民宿村落;三合院、四合院式清朝老屋得到修复和再现,打造成为精品网红民宿。2018年,李家大院获评“四川最具潜力民宿奖”,民宿年接待游客过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大幅

① 孙九霞、黄凯洁、王学基《基于地方实践的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逻辑与案例》,《旅游学刊》2020年第3期,第39页。

② 刘相军、孙九霞《民族旅游社区居民生计方式转型与传统文化适应:基于个人建构理论视角》,《旅游学刊》2019年第2期,第19页。

③ 郭凌《旅游减贫助推乡村文化振兴:一个尝试性的分析框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74页。

提高。村内房屋修复后,外出务工和在县城居住的村民每年年底都会自发回到村里,在李家大院开展聚餐、叙旧、祭祖等活动,乡村传统文化符号得到还原,乡村集体精神得到恢复。

### 2.精神文化认同记忆

乡村的精神文化(包括宗教、信仰、技术、艺术等)根植于乡村的物质文化中,通过节庆、活动、仪式等方式呈现,共同构成了乡村的认同和记忆。乡村民宿发展带来的旅游流,在满足其凝视需求的同时,还需要文化感知需求,促使乡村主体进行文化再现、传承和民宿体验相互嵌入、融合,并将其传播和再创造。在这个过程中,村民的集体精神文化纽带身份得到强化,认同感得以提升,乡村的记忆得到可持续再现。

2016年,浙江省桐庐县江南镇荻浦村因材施教,规划打造非遗民俗民宿旅游村。在乡村民宿改造中,荻浦村实施了“古生态整治提升、古建筑修缮利用、古文化挖掘传承、古村落产业经营”工程,重点挖掘古孝义、古树、古戏曲、古造纸四大特色古文化,着力打造“古风荻浦”,在百年古戏台开展传统戏曲表演,建设剪纸艺术馆,开设村级非遗图书馆,挖掘传统小吃等。民宿设计和装饰以非遗文化为主题,民宿主人要以非遗体验和传承作为特色活动,真正做到以生产、生活为载体的活态传承。在场景吸引和主人引导下,入住民宿的游客积极参与非遗文化体验,并通过短视频、朋友圈等新媒体进行宣传推广,2019年全村游客达到200余万人次。

红栋村和荻浦村的案例说明,乡村民宿作为一种承载地方文化价值的物质存在,对原有的乡村形态及其包含的物质文化进行了保留、再现,同时其历史文脉、民风民俗等精神文化通过节庆、演艺等形式进行再创造和传承,成为一种既面对现代化又保持乡村本土文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共同空间、产业、组织、价值的连接下,乡村民宿集群各主体的集体意识、身份认同等不断得到强化,并在旅游流的交互过程中进行对外传递和自我构建,不断调适新的精神文化认同记忆,是一条乡村本土文化传承、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优质路径。

### 三 乡村民宿集群驱动乡村振兴的践行路径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是后工业时代和后城镇化时代乡村全面发展的目标与导向。本研究基于乡村价值体系和乡村人地关系理论,从乡村民宿嵌入乡村“四层一体”发展框架探究其驱动乡村振兴的逻辑体系,运用案例论证乡村民宿集群驱动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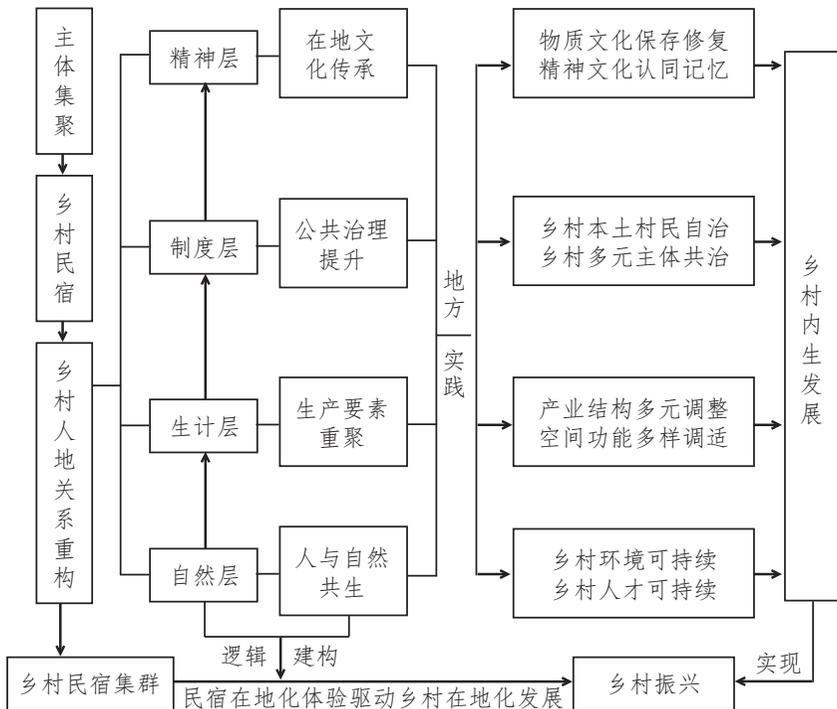


图2 乡村民宿驱动乡村振兴的逻辑与践行路径

研究发现:(1)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依托民宿的发展,投资主体、乡村居民、新村民、旅游者等多元主体

在乡村集聚,挖掘乡村资源及价值,从自然层、生计层、制度层和精神层重构了乡村人地关系。(2)乡村民宿集群的发展驱动乡村积极主动地改善人居环境,以满足游客对优质乡村环境的需要,以环保型产业发展方式推动乡村发展,避免走牺牲乡村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老路,并吸引更多人才投资乡村、停留乡村、发展乡村,从而实现乡村可持续和人才可持续发展,构建乡村环境发展“闭环”。这是乡村自然层的价值体现,符合“生态宜居”的要求。(3)乡村民宿体验本质是一种旅游方式,而旅游的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同步性,其发展将原本单向流向城市的资本、信息、人力等要素重聚在乡村空间,以旅游消费带动乡村发展。从原有较为单一的农业生产空间转变为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的消费空间,在生产、生活功能基础上增加了文化体验、艺术体验等,乡村的经济活力得到显著提升。这是乡村生计层价值的体现,符合“产业兴旺”、“共同富裕”的要求。(4)乡村民宿集群的发展以村民协作、共同参与为特征,激发乡村内生主体的自治意识,在协调各方利益、推动产业发展诉求的基础上,推进自治管理,优化多方参与的共治网络,完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内生性发展。这是乡村制度层的价值体现,符合“治理有效”的要求。(5)乡村民宿集群发展的最直观表征是乡村物质景观,最具乡村内涵和气质的是乡村文化。乡村民宿发展就是要保存和修复乡村的物质景观,塑造游客凝视内容。在游客体验过程中,乡村本土文化赋予各项活动与氛围精神内涵,从而引起游客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记忆,起到传承和推广的效果。这体现了乡村精神层价值,符合“乡风文明”的要求,实现了乡村民宿在地化体验驱动乡村在地化发展的逻辑体系。

基于乡村民宿集群驱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分析,从上述实践案例经验可以总结出其践行路径:乡村民宿集群发展以其“微度假旅游目的地”的特征性质,对自然生态环境提出了高质量的要求,这决定了乡村发展在定方向、做规划之初就要选择生态可持续道路。以生态环境本底为优势,发展乡村民宿旅游,加强乡村对外交流和乡村自身引流,构建乡村民宿“旅游生态圈”,将资源、资本、信息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重聚在乡村。以民宿接待为核心,调整乡村产业结构,调适乡村空间功能,提升乡村本土村民自治意识,提升村民自治能力,构建多元主体共治体系,增强乡村自我更新能力。在加强乡村物质文化保存修复的同时,共塑精神文化认同记忆,强化集体意识和身份认同,形成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乡村生态、经济、治理、文化多维度的内生性发展,实现乡村生态宜居、产业兴旺、共同富裕、治理有效和乡风文明,对于我国广大乡村特别是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路径参考价值。

值得讨论的是,乡村民宿集群发展可以作为新时代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和乡村振兴的一种有效参考路径,但其选址、设计、建造、运营及管理受到乡村空间、乡村主体、乡村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不具备发展民宿的乡村不能盲目投资民宿产业。同时,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探究乡村民宿集群在乡村经济、文化、治理、生态等方面的具体驱动效应,从而为乡村民宿发展及乡村振兴提供更精准的路径和决策参考。

[责任编辑:钟秋波]